

論“林海雪原”的 創作方法

絲 鳥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572

論“林海雪原”的創作方法

絲、鳥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四篇論文。“形象創造的現實主義 范例”一文，是從一些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以肯定現實主義巨著“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從‘蝕’到‘子夜’——在創作方法上的一個躍進”，從對茅盾前後期代表作品“蝕”和“子夜”的分析比較，以表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與現實主義的質的差異。“深刻的真實性，革命的理想性”，簡括地論述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特點，指出了它和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聯繫和區別。“論‘林海雪原’的創作方法”，是從創作方法的角度，對小說“林海雪原”在選材、塑造英雄人物、情節結構上的特點進行分析。這些文章，持論都比較明確，且有一定的創見。

論“林海雪原”的創作方法

絲 鳥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4 $\frac{5}{16}$ 印張·93,000字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6,500

統一書號：T10106·327

定 價：(7)0.32元

目 录

形象創造的現實主义范例

——“三国演义”的人物創造試探·····	1
从“蝕”到“子夜”——在創作方法上的一个跃进·····	53
深刻的眞实性，革命的理想性·····	107
論“林海雪原”的創作方法·····	121

形象創造的现实主义范例

——“三国演义”的人物創造試探

“三国演义”与任何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一样，它之所以能給中国文学以巨大的影响，內中的众多人物在历来各种不同讀者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但由于它在內容上极其深刻地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真实，而且也在于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讀者。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抱着与罗貫中相类似或甚至更正确的历史观点来談論类似三国故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和著作并不是沒有；在我国的悠久的历史上，比孔明、刘备、关羽、張飞、赵云这些人更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也并不是沒有，象曹操之类的奸雄人物自然也不是独一无二；但是，为什么独三国故事，独孔明、刘备、关羽、張飞、赵云、曹操这些人会被千百年来的广大人民記在心里？以至簡直可以用老少皆知来形容呢？这恐怕与“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对三国故事和人物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加工，并达到了輝煌的成就有直接的关系吧！

本文不想深入地分析“三国演义”的社会意义，主要的想就它在人物創造方面的問題来进行一些探討。因为是就問題来分析人物，也就不可能完整地分析性格，有时一个人物只提到他性格中的某一方面，有时又一个人物前前后后多次地提到。

(一)

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东汉末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的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越来越深刻化，越来越尖锐化了；它的病症也越来越暴露得显明了。东汉末年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各种病症的一次大暴发。

汉王朝发展到东汉末年各方面都露出了败丧景象。在经济上，土地空前集中，小生产者纷纷破产。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农民革命风起云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黄巾党只是无数次农民革命中的一次。由于小生产者的破产，汉王朝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剥削的来源，而且在军事上也大为削弱。正是由于内部的空虚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到了东汉末年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不变过去的不断向外扩展而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因而民族矛盾也加深了。在政治上更是一塌糊涂，首先统治阶级内部就充满着明争暗斗。

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是“家天下”。这就在政治上出现了两个副产品：外戚和宦官。外戚，可以依靠皇帝的裙带关系而做大官，掌大权。宦官则可以利用其与皇帝的特有的亲近关系而取宠，从而总揽朝廷大权。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皇帝无能的时候，这班人就可以独霸一切。但是外戚和宦官又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因此中间就不免有矛盾。而且随着皇帝的变换，外戚与宦官也随之而变换。往往随着一个新皇帝的上台，一批新的外戚和宦官会更替旧外戚和旧宦官的势力。而旧外戚和旧宦官又总往往不肯轻易地放弃自己原有的势力。这样，外戚与外戚之间、宦官与宦官之间就又出现了矛盾。东汉末年的统治阶级内部就充满着这些矛盾。

造成东汉末年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的尖銳化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士大夫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知識分子層，也是組成官僚機構的骨幹。它的形成，是發因於西漢的推舉制度。統治階級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企圖通過推舉以羅致一批文人來作支柱。它的成員仍然是封建階級內部的人物。推舉制度發展到了東漢就越來越濫了，以至形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惡劣狀態。但它最後終於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個階層在政治態度上的一個特點是主張加強專制制度，反對外戚和宦官的專權。這就又出現了士大夫階層與外戚、宦官的矛盾。

上面，就是“三國演義”的人物所處的最本質的典型環境。書中從第一回到三十一回作者以極其簡括的筆觸描寫了這種時代特徵（三十二回以後實際上已進入了“定三分”的描寫）。開篇第一回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靈帝則縱容宦官弄權。繼之而起的是“十常侍”朋比為奸，弄得“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到了第二回又寫了外戚頭領何進和宦官集團“十常侍”的爭權奪利。何進為了消滅宦官勢力密召董卓進京，但他反被“十常侍”先殺。袁紹等又消滅了“十常侍”的勢力。可是又由於董卓進京後橫行無度，就又引起了各鎮諸侯討伐董卓的鬥爭。由於各鎮諸侯之間都各懷鬼胎，結果是不但董卓平服不了，反而引起了互相殘殺。最後終於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之下，人民自然是受盡災難的。

“三國演義”的人物就是安放在這樣的典型環境中來描寫的。

“三國演義”是一部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作品。它的主要人物都來自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作者通過許許多多反面人物

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各种丑惡本質，如殘暴不仁、反復无常、阴險毒辣、利欲熏心和无止境的权势观念等等。为作者所歌頌的，都是封建階級内部的一些理想人物，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他本階級的劣根性。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活生生的个性表現出来的。拿曹操和董卓來說，二个人都非常殘暴，二人的經歷也有些相同。二人都是当宮廷危急的时候应召进京的（董卓由何进密召进京，曹操由献帝降召进京），二人都进京后不久就生篡逆之心；董卓曾演过以割舌断臂为戏的杀人“喜劇”，曹操也曾有过杀呂伯奢一家那样殘忍的事件；董卓为了貂蟬而丧命，曹操也曾为了鄒氏而狼狽逃窜……这些都是他們的共同之处。但曹操殘暴而又狡猾，而且很有点才干。董卓則徒有匹夫之見，只知任意胡为，因而他的权欲心理和暴虐殘忍的性格，就都在一种特別显露和野蛮的形式中表現出来。象“焚金闕董卓行凶”和諸如下述的行为，董卓都是无顧忌地干的：

董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慄失箸，卓飲食談笑自若。

象这样子的在大庭广众之前以杀人为戏，曹操是决不会干的。其他如刘备的仁慈而帶虛伪，袁紹的雄心勃勃而又怯懦寡断，关羽的重于信义、勇武超群而又“剛而自矜”，張飞的勇猛而直爽粗魯……都說明了“三国演义”的人物性格的共性和个性是結合得很好的。

罗貫中所以能通过活生生的个性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真实，这不但在于他能把自己的人物安放在錯綜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描寫，而且也在于他能将典型环境通过独特具体的环境來表現，能够根据人物所处地位的些許差异揭示出性格上的特

征，并使性格随着它所处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性格的邏輯性都是很强的。

袁紹，他是“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汉朝賢相之后裔”，有着特殊的社会基础，許多門生故吏都会支持他。这使他能籠絡到一批力量以割据一方，并因此而使他雄心无度，处处都不肯低头下首。但他毕竟是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人物。这个阶层发展到了东汉，虽然已經在社会上占居了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势力；但它所依靠的是汉皇朝的政权。一旦皇帝的政权发生了动摇，这个阶层也就随之而动摇。特别是在那种朝夕兵戈相見的形势之下，就更其显得无能为力。这种阶级的脆弱性表现在袁紹身上便是疑虑万端，怯懦寡断。他經不起时代风暴的襲击，一旦斗争如急风暴雨般地展开，立即就土崩瓦解。最后他终于彻底地敗績于官渡并因此吐血而死。这也正說明了腐朽衰老了的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官僚阶级已不得不在时代风暴的襲击之下讓出自己的地位。

曹操、孙权、刘备是在尖銳的阶级的、民族的和統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乘机冒出来的三种不同的力量。他們既不同于“十常侍”之流，也不同于袁紹，他們要显得更有力量一些，以至最后的爭霸权也只能是属于他們。正是他們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因而作者給予他們各异的性格和不同的发展道路。

作为“中常侍”之后的曹操，他所处的地位就是比較复杂的。就其出身來說，他是宦官之后，他起初的能够“步步高升”与他的由宦官发迹起来的父亲是有密切关系的。但他又依附着外戚，同时又从小就得到士大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的提携，他也非常善于拉攏这股社会力量；所以，他后来还成了反宦官集团的参加者之一。这样，他的社会势力就較为雄厚，使他能得

到統治階級內部的較多的支持，能够迅速地网罗到一批文臣武将。在这些文臣武将中，有好些是他的同宗，有好些是他自己的或他祖上的亲朋。因此，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性格也就比较复杂，讓他交織着殘暴、奸詐、貪婪、虛偽、多疑而又頗有政治和軍事才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否定性形象。曹操曾經說過“宁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这是曹操一生的为人哲学，也是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一条脉絡。作者大概也很欣賞許劭給曹操所下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評語。但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根据自己作品的典型环境是“乱世”，因而就竭力把这个人物描写成“有权謀，多机变”的“乱世之奸雄”。

曹操在軍事上的才能，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一步步表現得更清楚的，神机妙算如孔明者也始終把他看成一個勁敵。在政治上，当他初次在書中與我們見面的时候，就显示了他的眼光不同尋常。当何进为了要消灭宦官势力而決定召董卓入京的时候，首先估計到后果严重的就是他。果然不出所断，董卓一进京就表現得无法无天。这时候，首先設法鏟除这个暴虐之徒的是他，在各路諸侯中首先发起討伐董卓的也是他。接着，就是从起兵勤王，到“挾天子以令諸侯”，到几次企图謀皇篡位的一个长长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步步深入地剖析了这个人物的野心。与此同时，作者又突出地描写了他的殘暴奸詐的性格。而这，作者也是根据生活的邏輯逐步地展开，表現的方式也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

曹操一出場，作者就講了他幼年时“故作中风之状”以卖叔欺父的故事，先就使曹操这个人物給人一个奸詐的印象。繼之又写了他刺杀董卓的事。当时的董卓是一个为万人咒罵的坏蛋，他能这样做倒也象是有点“正义感”，以至中牟县令陈宫也

被他騙了过去，还拜倒在他的面前說：“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鴻鵠之志”。果然，他自己的行动立刻証明了他并非忠义之士。当他因行刺董卓不遂而逃难的途中，为了自己的安全，居然残酷地杀了呂伯奢一家。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杀人。从这里，我們立刻就辨認出这个人物是何等的殘暴！只是他的表现形式不象董卓那样愚蠢和显露，就是在那他認為是相当危急的时候，也是以隱蔽的、奇襲的方式出現的。这又正好說明了他在殘暴之中又帶有惊人的奸詐。但是这还是当他在落难的时候做的，还不敢凶暴到明目張胆的地步；一旦他得了势，他就明目張胆地杀人放火了。他为了报父“仇”，竟不惜号令部屬，“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而且真的做到了“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一进京之后，就生篡逆之心，而且恶狠狠地毫无顧忌地演出了“許田打圍”那样的把戏。但是他也与一切的好雄人物一样，非常善于耍两面手法。他的殘暴，更多的是通过阴險的两面手法表現出来的。正是如此，他就显得特别可怕。他杀人象是家常便飯，但杀的目的却是各有不同，手法也多种多样。他因为軍粮缺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就拿管粮官王昱的脑袋来作平服軍心的資本；他为了防刺，可以梦中杀人；他因恼怒于謀士揭他的老底，就可以“扰乱軍心”之名而加以处死。有时杀人手段之奇妙，簡直已經发展到了变幻莫測的地步。看看第六十九回“討汉賊五臣死节”中的曹操杀人場面吧！

夏侯惇尽斬五家老少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于教場立紅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曰：“耿紀、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之下。操教尽拏立于紅旗下

者。众官各言无罪。操曰：“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

尽命牵出漳河边斩之，死者三百余人。

这简直就是耍魔术！誰也会以为凡是救火的总可以顺着这个堂堂“魏王”的心了，那料得到反因此而遭罪呢？

这个奸詐的人物有时甚至还要做到使受害者不但不知道加害的就是他，而且还要感激他。当他与袁紹作战的时候，因“天气寒肃，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他就命令“要本处百姓敲冰拽船”；結果“百姓聞令而逃”。于是他就大怒，“欲捕杀之”。可是抓到了，他又說：“汝等快往山中藏逃，休被我軍擒获”。这真是凶暴无比，狡猾异常！他迫害了人家，人家还得向他道謝。

在曹操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惜才”，有时对才智之士甚至做到委屈求全的地步。这是有原因的。前面已經提到过，曹操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他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多方面的支持。他的惜才也就是他拉攏和收买士大夫階級和地方武装力量的一种表现，因而是完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也正是如此，他的“惜才”也就有他自己特定的标准和限度。如果一旦冒犯了他的尊严，或与他的思想行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那即便是他过去所最崇敬的人也是不惜反目或誅戮的。而且当他要謀害名士的时候，往往手段显得更毒辣，常常不是借刀杀就是軟刀杀；这一点，杀禰衡（是利用刘表来杀的）、荀攸、崔琰、荀彧可为典型的例子。

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閣下玄孙”；他非但是皇帝的同宗，而且是官宦之后。但同时又是一个出身于“販履結席为业”的貧寒家庭。这使他能有机会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一些疾苦，从而对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心理。因此，作者就賦予这个人物一些好的品質；又因他是汉景帝閣下玄孙，于是作者就把他当作一个好皇帝来歌頌，这与他的正統思想也不矛盾。

作者一方面把刘备描写成一个能够励政图治的能干皇帝，同时又给予这个人物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突出了他的仁慈爱民和礼贤下士。不论是他当县尉时也好，行军作战也好，总是“秋毫无犯，民皆感化”。陶谦三让徐州，他都婉言谢绝，以为了接受了就是无义。火烧新野的时候诸葛亮建议袭击荆州，他也表示“我宁死不做负义之事”。他也不肯无端夺取刘璋手中的益州。当撤退新野时，他带着十数万百姓一同逃难。在途中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而悲悯地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以至抱愧到“欲投江而死”。随后，因老百姓为曹军所杀，他又大哭说：“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所有这些都是很动人的，这也是刘备历来为广人民所肯定的原因。

刘备看人的眼光也很尖锐。他准确地看出了马谡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在白帝城托孤时他还把这一点告诉给诸葛亮。高明的诸葛亮没有把这一点放在心里，结果错用了马谡，并且造成了“失街亭”的严重后果。诸葛亮在这一点上非常佩服刘备，也很悔恨自己的失错。但对真有才能的人刘备是很器重的。象“三顾茅庐”时那种思贤若渴、恭敬谨慎的行动和态度，是非常感人的。诸葛亮既出，也真可说是“待之如师”的。其他，如对徐庶的态度也很诚恳；与关、张的关系，那更是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所能规范。

上面这些都是存在于刘备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较开明的性格。这些也与刘备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由于他出身贫寒，在那种封建关系密布着整个天地并左右着一切的时代，给他带来了许多不利，使他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一时得不到各种有力的（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支持。这是刘备在赤壁

大战以前一直处于飘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蜀汉的实力之所以始终弱于曹魏，一直偏居于东、西两川，以至虽有象諸葛那样具有宏才大略并能“鞠躬尽瘁”的謀臣，有关、張、赵、黃等忠勇双全、武艺过人的武将，也还是免不了最后灭亡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处于这种情势之下的刘备，为了自己的“大业”，为了挽救自己的弱点，他就不能不“礼賢下士”以罗致人才，并表示特别爱护百姓，以博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作为封建統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刘备，也显然地有着他本阶级的特色和偏見。如敌視农民革命，濃厚的功名利祿心理，虛伪以至殘忍等等。

刘备本是想利用其皇家后裔这一特殊条件，以屠杀农民革命的黃巾党为政治資本而取得一个較高的政治地位的。但如上所說，在那“群雄”并爭的时代里，要按理想打开一个局面，可也不是那末容易。結果是飄蕩了半生也得不到一块完整的根据地。于是，他感伤，悲叹。当他发现自己“髀骨肉生”的时候，立刻就“不觉潜然流泪”，悲叹起“日月蹉跎，老之将至，而功业不建”的苦衷来。但这是当他不得势的时候，当他得势了之后却又有另一种表现。赤壁大战以后，他占有了荆襄之地，他所处的地位改善了，立即就忘形起来。正如五十四回和五十五回所描写的，刘备过了东吴成了亲，很快就为声色所迷，忘了他先前半辈子辛苦奔波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不是孔明有先見之明，赵云的忠心謹慎，几乎就誤了大事。在这里，表现了刘备性格中脆弱无力和与时俱增的腐朽的一面。进入两川之后，他所处的环境更好了，实力也更雄厚了，他的封建利祿观念也更发展了。他企图割地封侯，好在有赵云等的劝諫才沒有做成。此外，这时候他的“礼賢下士”也已渗透进新的内容。至于象八十一回、八十三回中所描写的，則不但体现了刘备具有濃

厚的庸俗的封建殉道思想，那种一意孤行的做法，也并不缺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残忍。为了“雪弟恨”，他居然可以不顧千百万人的生命。当时东吴曾遣使求和，答应“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图灭魏”。但是刘备一概拒絕。正如赵云在劝諫时所說的：“汉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孔明、秦宓也曾这样地再三劝阻，但刘备也都一概拒絕。这不但表明了刘备为了私仇、为了个人“殉道”可以忘記一切，而且也說明了这个人物的所謂“听信良言”是有限度的。至于象四十二回所写的“刘备摔阿斗”这句话，已被民間当作是虛伪的同义語了。

孙权；作者固然也是把他作为一代英杰来处理的，但又突出地給他一种动摇性。多次遣使与曹魏和好以至称臣的是他，多次联刘反曹的也是他。他是在联刘反曹这問題的犹豫不定中显示自己的性格的。这种性格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先是在諸葛亮的反激和开导之下表示了“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灭曹操。”实际上他內心里根本还没有定数。但好在这时的周瑜已在諸葛亮的激怒之下，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随之孙权也就在周瑜的劝諫之下，“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以表示坚决抗曹。問題发展到了这里，誰也会認为孙权的决心已是坚定不移的了，可就是一个諸葛亮看出了“孙將軍心尙未稳”。果然，在周瑜的詢問之下，孙权說出了“但忧曹操兵多，寡不敌众耳”这几句心里話。最后經周瑜具体地分析了利害，他才真真实实地下了“孤当与曹賊决战”的决心。孙权所表现的这种犹豫和动摇，正体现了东吴处境的困难。这也就是說，孙权的这种动摇性格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的。他一方面承繼着父兄的“勛业”，有丰饒的江东之地，天然的长江之險，这种物質基础和自然环境使他不甘居人篱下。但另一方面，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强大的曹魏，这确是一只不好惹的老虎，一搞不好，就有伤害自己生命的危险。再说，与他搞联盟的又是一个能干的刘备，“统一中国，重振汉室”正是刘备毕生所要奋斗的目标。这又不能不使他有所警惕。再就赤壁时的情况来说，孙权知道得清清楚楚，刘备并无实力，必须要由他来担任主攻任务，这更使他不能不有更多的考虑。所有这些情况合在一起，孙权就不能不采取看风使舵，见机行事的办法。他的动摇性也就因此而产生。

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推移这一点，在关羽这个形象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曾经有人认为关羽的性格颇为矛盾，这是有他一定的根据的。关羽的性格比起张飞、赵子龙等其他武将来的确要复杂得多。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条理、有规律的。关羽的性格主要的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武艺过人，而且颇有胆识；同时又重于信义，威武难屈；另一方面，是与他的信义观点联系着的利己主义和显明突出的骄傲情绪。这两方面的性格是矛盾的，但又是和谐地统一着的：前一方面是产生后一方面的基础，后一方面则促进着前一方面。而且，这样的性格统一在象关羽那样的一个武将身上，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这也是与具体的时代特征有关的。在象三国那样的动乱时代，武功是格外吃得开的——统治阶级需要依靠武功来争权夺利，统治人民；人民则需要用武功来反对残暴，反抗压迫。因此，一些所谓武艺过人的人，在社会上就特别受人重视。但不论是统治阶级也好，不论是人民也好，又都希望有适合自己的社会秩序——统治阶级借社会秩序来维护其地位和统治权，人民则想依靠社会秩序来过和平生活。但在一个动乱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所制定、所信奉的法律、伦理已随着王朝的衰落而动摇，它们已再也不能严格地约束人们的

思想和行动。这就又失去了维系社会秩序的依据。于是信义就被提到最高度上来了。统治阶级企图以信义为幌子，以达到他们继续统治人民的目的；人民则借信义来团结自己，反对压迫。由此可见，关羽的矛盾性格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势的产物；反过来说，关羽的矛盾性格正好是体现了社会特征的。

正是关羽有着这样的矛盾性格，也就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行为。他曾有过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和“单刀赴会”等等一系列的英雄业绩，并因此而显赫一时，威震华夏，就蜀汉的武将来说，怕他的功劳是最大的。可他也曾有过降曹、释曹的行为，而且是失败最大，下场最惨的一个。他非但最后全军复没，丢了大片的重要土地，而且连自己的脑袋也没能保住；就“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来看，蜀汉的事业简直就可说大半是断送在他的手里的。所有这些，天才的罗贯中都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来说明的，而是密切地与人物所处的环境扣合起来，从发展中形象地展示出来的。这里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不妨仅就诸葛亮给关羽的一句中肯的评语：“刚而自矜”（“三国志”中也有这句话），来加以简略的分析。

关羽的骄傲是在“三国演义”中一出现就深深地使人感觉到的。象斩华雄时的那种情形，就已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情绪。但在这时候他还正跟着刘备处在飘流的状态之中，他自身的社会声望也还没有形成，因而好多地方还是收敛着的，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超出一般武艺高超的封建武将所常有的自豪心理；而且到了不得意时还可以有条件地屈身于他的大仇敌——曹操的篱下。但经过了过五关斩六将，在社会上树立了相当的威名以后，他的骄傲情绪突出地显现出来了；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就常常是作为他自负的资本。到了赤壁大战以后，刘备的地位已大大改善，他的功劳也更大了；特别是他领